

浙江海洋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传播与海上交往

——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

屈广燕◎著



海洋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
2015 年度自设课题（编号：15HYJDYY01）

文化传输与海上交往

——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

屈广燕 著

海洋出版社

2017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播与海上交往：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 / 屈广燕著.
—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027-9761-4

I. ①文… II. ①屈…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浙江、
朝鲜—元代—清代 IV. ①K295.5②K312.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567 号

文化传播与海上交往——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
WENHUA CHUANSHU YU HAISHANG JIAOWANG ——YUANMINGQING
SHIQI ZHEJIANG YU CHAOXIAN BANDAO DE LISHI LIANXI

责任编辑：黄新峰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3.25

字数：230 千字 定价：58.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关于古代浙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历史交往，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迎来了浙江与高丽交往的大发展，“两宋时期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促成明州港成为宋丽民间贸易的主要港口”。^①南宋时期浙江与高丽海上贸易堪称古代中外交流的典范，它不仅连接了两国的经济贸易，而且还以其丰富的内容承载了政治、文化以及人员往来等各方面的交流，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历史联系的整体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限于资料。元代虽然开放，但留存下来的史料较少。明清实行海禁，浙江对外交往主要是民间往来，官方史料疏于记载，只言片语或保存于地方文献中，或散见于文人文集中，尚无系统整理。近年来，随着“从周边看中国”理念的传播与实践，朝鲜半岛的历史文献得到关注，从而为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交往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本书的写作契机也正源于此。

陈高华先生认为元朝统一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是频繁的，方国珍、张士诚与高丽交聘往来就表明了双方的接触事实。^②此外，元代也是继隋唐之后，朝鲜半岛僧人进入中国的又一个高峰期，前往浙江求取佛法者屡见不鲜。^③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皆实施某种程度的海洋禁限政策，浙江与朝鲜半岛的传统经贸往来戛然而止，但双方的历史联系和彼此认知并没有因此完全中断。一方面，天然的海洋关联使双方呈现出以“海难”“海患”为表象的非常态交往。所谓“海患”主要是指倭寇。浙江和朝鲜沿海都长期遭受倭寇的侵扰，双方在抗倭中发生了一定联系，尤其是壬辰倭乱爆发后，浙兵集团进入朝鲜助其抗倭，除了对战争本身的贡献外，浙籍兵将与朝鲜士人展开了广泛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浙人移民朝鲜半岛

① 张伟：《略论明州在宋丽贸易中的地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 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

③ 张言梦：《元代来华高丽僧人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9年，第4期。



的高峰。^①所谓“海难”指互相救助海难船的活动。明弘治年间的崔溥、清嘉庆年间的崔斗灿均因海难漂流至浙江，分别留下了详细记录漂海经历的文字，即《漂海录》和《乘槎录》，^②而朝鲜边防机构亦留下了数量颇多的明清浙江漂海人的问讯记录。双方漂海人虽然以渔人商人为主，但漂风驻留彼国之际必然也进行某种交流，从而形成某种认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是浙学取得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无论是王守仁的阳明学还是黄宗羲的实学思想，^③都对朝鲜士人产生了一定影响，隔空对话也体现出朝鲜文人对浙学的一种认知状态。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力求在文献史料和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深度挖掘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全书将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从文化传播和海上交往两方面进行论述。

上篇分为三章。第一章“佛法东传”。元廷奉行喇嘛教，汉地佛教总体趋于衰落，但禅宗依然得到了发展，宗师辈出，如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云峰妙高、元叟行端、晦机元照、笑隐大猷等均活动于浙江，因此浙江实际上成为了元代汉地佛教的中心之一，所以高丽僧众南下求法时，浙江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地。本章将以中峰明本与高丽君臣、石屋清珙与太古普愚、平山处林与懒翁惠勤的交往体现禅宗佛法东传的情况。第二章“浙学影响”。浙江地区文风发达，理学敦厚，学派纷呈，如元代的金华学派、明代的阳明学派、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这些流派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学术版图中可谓独树一帜，其影响范围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对全国以及东亚地区都有着较强的辐射力，自然也影响着朝鲜半岛的学术发展。本章将

① 受入朝抗倭的影响，明后期乃是浙江移民朝鲜的高峰阶段，孙卫国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专门对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进行了梳理。而牟元珪在《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则对浙籍将领施文用、徐鹤、张海滨、片碣颂等人的后裔现今居留韩国情况进行了整理。王秋华的《明万历援朝将士与朝鲜姓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中涉及多位浙籍将士的留居及其后人在朝鲜半岛的情况。

② 关于崔溥《漂海录》的研究有王金龙的《崔溥行经台州路线考辨——兼台州东北部历史地理探析》（《韩国学论文集》（第十辑）2003年）、潘承玉《明清绍兴的人口规模与“土多”现象——韩国崔溥〈漂海录〉有关绍兴记载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关于崔斗灿的《乘槎录》研究，主要有范金民的《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作者认为这是清代近300年间朝鲜人有关中国运河全程的唯一文献。

③ 钱明：《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李廷平：《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以元代金华学者与高丽士人的交游、阳明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朝鲜对浙东学者的评价三个方面来阐述浙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第三章“学人笔谈”。明清更代后，朝鲜朝野将清朝视为礼崩乐坏、文化落后的夷狄之国，认为“明亡之后无华夏”“胡人无百年之运”，不断居高临下地蔑视这个现实中的上国，曾经兴盛的皇华酬唱不复再现。这种局面被杭州三士严诚、潘庭筠、陆飞与朝鲜洪大容的交往所打破。虽然在此之前，朝鲜使臣也曾与清朝士人进行过笔谈，建立了友情，但是杭州三士与洪大容的交游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入清以后，朝鲜文人第一次与江南文士交游，更为重要的是，杭州三士所展示的才情使朝鲜文人开始重新审视清朝文化，主张学习清代的先进文化和技术，这对后来朝鲜“北学派”兴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杭州三士为核心，探讨他们学术观的形成环境及背景，分析他们向朝鲜文人输出价值观的内涵，强调他们彰显的浙江学术对朝鲜文人对清观、学问观的现实影响。

下篇亦分为三章。第一章“元末明初浙江与高丽的海上交往”。元朝实施对外开放、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海陆交通发达，贸易规模庞大。高丽素有贩商风习，上自王室下至走卒皆热衷于商事，并且作为元廷的姻亲之国，高丽的地位是当时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元、丽之间的陆路、海路贸易都应是相当辉煌的，而庆元港依然是浙江与高丽接触的最主要港口。元末江浙地区为张士诚、方国珍割据期间，他们急切地需要发展海洋贸易来充实自身，以求在乱世中自立自保，而高丽当时正处于红巾军侵扰及德兴君之乱的时期，辽东贸易通道受阻，又有南迁都城避难的考虑，也更加重视南方的海路贸易，因此双方交聘不断，并由此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使得明初参与兰秀山之乱的部分浙江沿海民众选择逃往高丽生活，明朝与高丽就遣还这些人员的交涉就成为影响明、丽建交的一项重要问题。第二章“倭患下的明代浙江与朝鲜”。倭寇问题困扰明朝和朝鲜始终，双方以各自御倭为主，但逐渐趋于合作，最初是传递情报、解送倭人，到万历壬辰年发展至直接的军事合作。浙江沿海作为倭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长期御倭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壬辰倭乱期间由浙兵集团传入朝鲜，对朝鲜新式军队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基础。同时此役也将浙江与朝鲜的彼此认知推向了新高度，朝鲜兴起西湖热，浙江出现编修朝鲜文献热潮，而大量移民的出现更对后世产生重



要影响。第三章“海难互助”。天然的海域联系使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船只很容易在海难发生后随洋流漂流至对方境内。浙江地方因漂到的朝鲜人崔溥、崔斗灿均留有漂海日记，从而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救助朝鲜人的核心资料和切入点。通过对二人的境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倭患频发的年代，明朝和朝鲜沿海官兵对海难船只判断很容易向于怀疑为倭船，从而导致误杀事件的发生。入清以后，这种误杀机率大大降低，海难救助成为常态，同时也成为双方经营朝贡关系的重要环节。

目 录

上篇 文化传输

第一章 佛法东传	2
第一节 明本教诲：中峰禅师与高丽君臣	2
第二节 石屋授法：清珙禅师与太古普愚	8
第三节 平山印可：处林禅师与懒翁惠勤	12
第二章 浙学影响	16
第一节 金华学派对高丽士人的政治影响	16
一、高丽李齐贤与陈樵、许谦	18
二、李穀、李穡父子与金华学人	21
第二节 阳明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	26
一、阳明学传入朝鲜	26
二、朝鲜官学的长期排斥	28
三、朝鲜对阳明学的部分受容	35
第三节 从朝鲜对浙东学者的评价看浙学的影响	39
一、朝鲜编修宋明遗民传概况	39
二、对金履祥、许谦的评述	41
三、对黄宗羲、万斯同的评述	43
四、朝鲜后期对浙东学者评述的影响因素	46
第三章 学人笔谈	48
第一节 “天涯知己”人物概况	48
第二节 严诚与洪大容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50
一、《杭传尺牋》与《日下题襟合集》	50
二、对彼此的影响	53



第三节	以潘庭筠和朝鲜北学派为核心的中朝友人圈	57
一、	潘庭筠与“汉学四家”的书信往来	57
二、	潘庭筠与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的会面	62

下篇 海上交往

第四章	元末明初浙江与高丽的海上交往	68
第一节	元末浙江割据势力与高丽的交聘	69
第二节	兰秀山之乱与明、丽关系	75
第五章	倭患下的明代浙江与朝鲜	80
第一节	15 世纪前后明朝和朝鲜各自御倭与间接合作	80
一、	各自御倭政策	80
二、	间接合作	84
第二节	宁波争贡的发生与朝鲜的反应	88
一、	宁波争贡始末	88
二、	朝鲜对宁波争贡的反应	90
第三节	16 世纪中期倭患中的浙江与朝鲜	93
第四节	壬辰倭乱中的浙江与朝鲜	98
一、	浙兵入朝与《纪效新书》的传播	98
二、	朝鲜的西湖热	104
三、	浙人的朝鲜文献编修热潮	109
四、	移民高峰	117
第六章	海难互助	121
第一节	明代浙江与朝鲜的海难互助	121
第二节	清前期与朝鲜的海难互助——以浙江案例为核心	126
一、	清朝对朝鲜海难船的救助	126
二、	朝鲜对清船的救助	133
三、	清朝与朝鲜海难互助的政治内涵	147
结语：	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交流的特点与意义	150
附录	崔斗灿《乘槎录》选录	154
参考文献		194

上 篇

文化传输

第一章 佛法东传
第二章 浙学影响
第三章 学人笔谈

第一章 佛法东传

浙江佛教兴盛，名刹林立，名僧辈出，吸引了众多异域僧人前来学习。高丽以佛教为国教，僧侣地位崇高，世家贵卿子弟出家者亦不在少数，其中北宋神宗时期高丽王子义天就曾入浙求法。他巡礼名刹，历访高僧大德，学习华严、天台教义及戒法和禅法，回国后，重建高丽天台宗，给高丽佛教注入很大活力。到了高丽后期，王氏政权进一步走向衰落，佛教也越发表现出颓败势头，由国家支持的各种佛事的频繁程度和奢靡程度较之前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①抨击佛教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为了改变现状，高丽僧人热衷前往元朝求取佛法。元廷奉行喇嘛教，汉地佛教则以禅宗为主流，北方盛行曹洞宗，南方传承临济宗，如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云峰妙高、元叟行端、晦机元照、笑隐大猷等均活动于浙江，浙江实际上成为了元代汉地佛教的中心之一，所以高丽僧众南下求法时纷纷前往浙江。

第一节 明本教诲：中峰禅师与高丽君臣

天目中峰（1263—1323年），讳明本，号幻住、幻庵、中峰等，浙江钱塘人，师承高峰原妙，“有高峰原妙禅师，居天目山狮子岩，立死关以待参学。明本往叩之，师欣然，知为大器也。久之，明本诵金刚经，恍有开解者，谓识量依通，虽于义趣通解，终非悟也。已而薙染给侍死关，昼服力役，夜事禅定，十年而学成，豁然超脱，宗旨别传，九流诸子罔不淹贯，激扬提唱，机锋翕霍，圆转不穷，时称大辩焉”。^②明本的思想多元且圆融，他将禅宗与各家学说加以会通，泯除彼此之歧异，主张密、教、律、禅四宗共传一佛之旨，为禅宗争取发展空间，对元代禅宗的弘扬可谓贡献至伟。其毕生弘扬临济看话禅，同时又提倡禅净融合、教禅不离等思想，是元代

① 何劲松：《韩国佛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66页。

②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14，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480页。

汉地佛法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江南古佛”。中峰圆寂后，其语录、著作经参学门人北庭慈寂等整理编为三十卷，称为《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元顺帝元统二年颁赐入藏。^①另有日本刊行《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收入已续藏，载录《广录》未收之示众、法语、偈颂等。

中峰禅师追随者众多，“东殫三韩，南极六诏，西穷身毒，北弥龙沙，则其近地，概可知已”。^②明本游历江南各地，随处结庵，接触许多居士，尤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明本一系的兴起及社会影响力即是得益于士大夫的支持。当时元廷的公卿大夫多与中峰和尚有所交往，“器识如徐君威卿，（清慎）如郑君鹏南，才艺如赵君子昂，一闻师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师）言容，无不歆慕终其身”，^③但是面对世人的礼拜，“公固逃之，莫释重累”^④“行省丞相拜布哈、行宣政院使张闾诸达官，尤加敬爱，每径山虚席，必以待师，师固不受乃已”“天子万里延慕，屡欲召至阙庭，而卒莫之能致也”。^⑤中峰对此解释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习头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没齿。平昔懒退，非矫世绝俗，盖以文字则失于学问，参究则缺于悟明，寻常为好事者之所称道，盖报缘之偶然耳”。^⑥

忠宣王王璋（1275—1325年），字仲昂，初讳源，谥忠宣，陵号德陵，是高丽27代国王忠烈王王昀与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的长子，蒙古名为益智礼普化。忠宣王在中国居留达35年之久，这在他51年的生命中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了。忠宣王亦笃信佛教，居留元朝一直所忙碌的就是佛事，“声色之娱、鹰狗之玩，不萌于心，唯酷嗜屠屠之法”，^⑦曾多次派人前往浙江礼佛。皇庆元年冬（1312）忠宣王遣使洪淪、蒋得渲、林宣、金完之、吴仲景等至杭州修善慧因寺，并以疏征僧慧福继承讲席。

① 今人的佛教史、禅宗史著作都会提及中峰明本，但着墨不多。目前对明本进行过详细论述的著作主要有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释有晃的《元代中峰明本禅师之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48，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释印旭主编的《元代高僧中峰明本禅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② 郑元祐：《侨吴集》卷9《立雪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页。

③ 郑元祐：《侨吴集》卷11《元普应国师道行碑》，第35页。

④ 释大诰：《蒲室集》卷15《祭中峰和尚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页。

⑤ 祖顺：《中峰和尚行录》，收录于《天目中峰和尚广录》，磻砂大藏经影印宋元版，线装书局，2005年，第646页。

⑥ 祖顺：《中峰和尚行录》，第647页。

⑦ 李齐贤：《益斋乱稿》卷9上《忠宪王世家》，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2册，第589页。



又在杭州印造大藏经五十藏，施诸名刹如杭州之上竺、下竺、集庆、仙林、明庆、演福、慧因、崇光、妙行、青莲、惠力等。^①

高丽忠宣王王璋对中峰禅师闻名已久，仰慕已久，但二人最初的交往并不顺利。延祐元年（1314年），忠宣王派洪瀹赍书币向中峰叙弟子礼：^②

弟子太尉沈王王璋顿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峰和尚大禅师座下，惟璋眇德叨预天姻，爵禄虽荣常遵佛化，仰灵山之付属，怀觉树之潜辉，每对真容诚切瞻恋。至于修崇胜事听演教乘，颇尝及矣。而禅宗向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审吾师道传天目名简帝心，良以江山迢遥尚阻执侍，渴仰醍醐思沾花雨，极悬悬也。缅想天人叶赞法候胜常，今专遣洪瀹，谨赍信香代申礼敬。久向和尚养高泉石，他方多请住持，曾未垂诺，奈无相法身欲隐弥露，曷若出世度生广开利益。然闻江南灵踪圣境久欲游观，秋冬间傥得旨南来，首当参扣，愿兴悲济。先此布区区，幸祈法照。

中峰禅师并不相信身处显位的忠宣王会诚心求佛，认为“一国之主，游刃群机以宁海宇，何暇存神内典以亲方外之学乎？”“十金之家，沉酣五欲，不暇他顾，而况富有国土？”^③于是中峰回信中全是委婉谦辞，尽显回绝之意：^④

伏惟阁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姻懿亲，为国尊行。口浪性海巨筏为佛雄藩，仁声仁闻被乎寰区，有德有言无愧简册。顾某何人敢当垂念？过蒙洪参军与奇长老冒尘触喝，徒步登山，出王钧絨侑之厚币辞情恳恳，自敌以下有不敢当者，而况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观信使之聪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贯无碍也……又承谕及某不肯住持之说，斯言似为过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于人而独擅其退休闲逸之计，不思法道之隆替，诚法门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当退遁，岂有它哉！惟王谅之。闻王驾有江南游览之念，夫以王心虚明，物境洞照，能遍涉法界于不动神

① 《慧因寺志》卷7《大功德主沈王请疏》，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明文书局，1980年，第115页。

②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答沈王书（来书附）》，第388页。

③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与嗣沈王》，第390页。

④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答沈王书（来书附）》，第388、389页。

情之顷，恐不待走轻车策骏驹，然后为得也。

我们所能见到的忠宣王与中峰禅师之间往来的信函并不多，除上述这封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中还收录了一篇《答高丽白尚书》，是忠宣王以“四疑问”请教于中峰禅师，中峰则一一作答。值得注意的是篇首有这样的语句“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阁下笃信正法，何以得兹？”^①可见此时中峰禅师对忠宣王的态度已有改观。又《与嗣沈王》中写到“惟王之信根，决定是深，志愿天然其重，若夫根不深，志愿不重，则应念为诸欲因缘所移，安肯寄音于无似野僧需入道之语耶？”^②这种态度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发生的，应该经历过一个渐进过程。可以想象得出，第一次与中峰交往碰壁后，忠宣王可能又多次遣人以更诚恳的态度、更恭敬的礼节送书函于中峰处，使得中峰禅师逐步了解其礼佛的诚心。

忠宣王并不满足于书信往来，遂于延祐六年（1319年）亲自前往天目山拜访中峰，“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谒师草庐咨决心要，请师升座为众普说，师激扬提唱万余言。王复求法名别号，师名王以胜光，号曰真际。王因建亭师子岩下以记其事”。^③中峰禅师对于忠宣王的到来显得格外高兴，“今日太尉王与宣政平章相国王子从官，皆是夙承佛记远种灵根，而花茂果圆相逢此际，岂非一时庆会千古因缘者哉！”“王之躬诣补陀岩，使观世音自在神通光明世世增长，其无作妙用殊胜功德未易以算数知也”。^④中峰兴起而为忠宣王建于狮子岩的真际亭赋诗两首：^⑤

高亭结构标真际，体共云林一样闲。山势倚天忘突兀，水声投涧自潺湲。伽陀迥出言词外，海印高悬宇宙间。伫看凭栏人独醒，又添公案入禅关。

凤舞龙飞甲众山，振衣直上费高攀。层层石磴深云锁，隐隐禅林尽日闲。自古名流多驻蹕，昔年王气亦相关。从前不涉高巖外，宁识东溟指顾间。

①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答高丽白尚书》，第391页。

②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与嗣沈王》，第390页。

③ 祖顺：《中峰和尚行录》，第644页。

④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1上《示众》，第293、294页。

⑤ 徐嘉泰：《天目山志》卷3《真际亭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诗中中峰喜悦之情及对忠宣王赞赏之意表露无遗，而忠宣王拜见中峰之处亦被命名为沈王峰，“沈王峰，在真际亭后，高丽沈王参叩中峰于此，故名”。^①

中峰还专门为忠宣王作《真际说》，解释了“号之真际”的缘由，“真际乃佛祖所诣之根本法门，更无一法能过于此者。真际，诚一心之异名也”“以真际之体，散于森罗万象之顶，标于色空明暗之端，更无毫发能外吾真际者”“若果欲与真际念念吻合，念念圆融，念念不痕，念念无间，直须是工夫熟，知解泯，能所忘，向不知觉处豁然开悟，如获旧物，如归故家，心户洞开性天廓尔，十方世界不见丝毫过患，是谓心空及第。于斯时也，真际二字亦无地可容矣”。^②中峰又在《示海印居士》中海之如何参禅，“原夫生死情妄，不从天降，不从地涌，不从空变，不因人与，盖由无始时来迷失自心，于清明日妄见空华，轮转迁流至今不息。始因自迷受此沦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凡日用提话头做工夫处，觉得昏沉扰扰散乱纷纷把捉不定处，初无一点外障，只是一个为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觉把捉不定时，只消猛以生死常随鞭逼，久之纯熟自然合辙。或未合辙时，只向所参话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与同生死与同死。第一，不许别求方便；第二，不可归咎于缘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感情，虽未到家，亦不问何时可到。古宿谓‘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心鲜有不获相应者”，并用“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之句来勉励忠宣王。^③世人获中峰禅师一语不啻得重宝，此次忠宣王能得禅师如此耳提面命的教诲，自然感激非常，遂谓人曰：“吾阅人多矣，未有如师福德最胜者。获师开示，涕泪感发”。^④

在许多元代文人文集中都可以看到或简或详的关于忠宣王拜访中峰禅师的文字，如《吴都文粹续集》之《姑苏能仁庵记》有“高丽君长即山问道”；^⑤《蒲室集》《祭中峰和尚文》有“王公问道，跪拜趋事。亦有岛夷，致书奉币”；^⑥《道园学古录》《智觉禅师塔铭》中有“驸马太尉沈王王璋，

① 徐嘉泰：《天目山志》卷1，第352页。

②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25《真际说》，第600页。

③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5上《示海印居士》，第368页。

④ 郑元祐：《侨吴集》卷11《元普应国师道行碑》，第35页。

⑤ 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30祖瑛《姑苏能仁庵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

⑥ 释大诰：《蒲室集》卷15《祭中峰和尚文》，第11页。

使人从师问法，意以为未足，请于上，亲往见之。既见，构亭岩前，曰‘真际’表得法也”；^①《侨吴集》《元普应国师道行碑》有“高丽沈王以天属懿亲，万里函香拜礼”。^②《谷响集》中亦诗记录此事：^③

众峰序列作愁颜，鹤怨猿惊尚未闲。月满萝庵人寂寞，风生松岭涧潺湲。

王因问道来天上，师为逃名去世间。独抚遗编成浩叹，水云无路扣玄关。

西峰泉石可怡颜，地远尘踪日月闲。楼观耽耽横峭嶂，杉松矗矗蔽潺湲。

安危岂在羊肠里，宠辱偏生马足间。自是名王尊有道，闲携宾从及柴关。

忠宣王与中峰禅师的交往最终能成为佳话得益于一方真诚礼佛，一方德行仰止。佛教在高丽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地位，是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忠宣王壮年退位后旅居元都，虽与大儒从游，以考究自娱，但从未放弃过对政局的关注，并实际上遥控着高丽国内，在这种国事、佛事、俗事交杂的情况下该如何参禅是忠宣王需要面对的问题。他曾以此专门请教中峰，“谓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为菩萨？”中峰答道：“使置身于五欲尘劳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念念欲远离尘劳，虽未即清静，亦可称菩萨”“佛法无二无别，总因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绿，鹊噪鸦鸣，更无一点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宝树，玉殿琼楼，更无一点不是世间法。一大藏教祖师西来，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别名相所碍”。^④并且中峰认为“政当参时都不妨治国齐家营福修善等事”“以此道治国则国无不治，理民则民无不安，崇福则福无不资，祈寿则寿无不丞”。^⑤这就与早已植根于忠宣王头脑中的“佛教信仰是以国家为本位”的思想相吻合了。^⑥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智觉禅师塔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页。

② 郑元祐：《侨吴集》卷11《元普应国师道行碑》，第35页。

③ 释善住：《谷响集》卷2《偈读中峰和尚和沈王王璋留题真际亭诗，因而有感，遂次其韵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42页。

④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答高丽白尚书》，第392页。

⑤ 慈寂等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6《与嗣沈王》，第391页。

⑥ 金得槐著、柳雪峰译：《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延祐七年（1320年），忠宣王“复请于帝，降香江南”，只是这次主要目的是避祸，所以行至金山寺就被召回。之后，忠宣王因卷入元室政治斗争而被流放至吐蕃撒思吉之地，与中峰的交流未能延续。

第二节 石屋授法：清珙禅师与太古普愚

清珙禅师（1272—1352年），俗姓温，字石屋，江苏常熟人，早年依苏州兴教崇福寺之永惟法师出家，后登天目山参访高峰原妙，“服勤三年”，又在高峰禅师的指引下参访及庵宗信禅师，经6年，得印可，及庵宗信称其为“法海中透网金鳞”。后出入吴越，激扬禅社，广结善缘，于霞雾山构筑草庵，名之曰“天湖”。因信众和平山处林禅师的敦请，曾住嘉兴福源寺7年之久，后以老引退，复归天湖。“至正间，朝廷闻师名，降香币以旌异。皇后赐金襴衣，人皆荣之”。清珙不好名利，前后居山隐修40余年，^①自作诗云：“四十余年独隐居，不知尘世几荣枯。夜炉助暖烧松叶，午钵充饥摘野蔬。坐石看云闲意思，朝阳补衲静工夫。有人问我西来意，尽把家私说向渠。”^②

清珙主要提倡切直平易之古德禅风，《〈福源石屋珙禅师语录〉序》云：“自唐以来，诸祖相传，列派分宗，行棒行喝，至于擎叉舞筴，挽弓辊球，各立玄门，建化不一，究其大机大用，无非直显心体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入室示众等语，观其激扬开导，要皆肆口而说，直截无隐。始及南宋以后诸师，渐乃组章绘句，流为造作，甚至有短拙新巧之论，使学语无稽之徒转相沿袭，大为有识所耻。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传心，必惟自证，才涉言诠，即第二义，而况务为造作者耶！……福源住山石屋珙公，早得及庵之传，居山三十余载，入定观心，妙达真体，故其言语不是造作，实自胸襟浑然流出者也。读其山居诸偈，绰有寒山子之遗风，以及上堂示众诸语，一皆切直谛当，有足警发于人，岂学语者可以意识而模仿之哉！”^③可见清珙坚持禅宗祖师不立文字、直截了当的禅风，他自称：“一大藏经闲古

① 元旭：《福源石屋珙禅师塔铭》，收录于至柔等编《石屋清珙禅师语录》，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语录部十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89、790页。

② 至柔等编：《石屋清珙禅师语录》卷下《七言绝句》，第771页。

③ 至柔等编：《石屋清珙禅师语录》，序言，第751页。